

Accepted final version of manuscript of

陈俊 (Chen Jun) and 康文林 (Cameron Campbell). 2024. 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与出身构成 (1786-1908) (Trends and Patterns in the Banner Affiliation and Qualifications of Low- and Mid-Level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歷史檔案 (Historical Archives)*. 3:104-112

Fo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Chen Jun at [jun.chen.cnu@qq.com](mailto:jun.chen.cnu@qq.com) or Cameron Campbell at [camcam@ust.hk](mailto:camcam@ust.hk)

PDF of published version [available for download at CNKI](#) (link may not work outside mainland China).

#### English Abstract

The *Zhongshubeilan* is a roster of Qing dynasty military officers. It is rich in detail, longitudinal, and reliable. It is ideal for studying the caree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ng military officers. Based on 73 editions of the *Zhongshubeil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anked officers in the late Qing. We begin by examining the share of officers affiliated with the Eight Banners. The proportion of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Green Standard Army who were bannermen decreased by nearly 30%,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low-ranked officers who were bannermen remained below 8%. The higher the rank, in other words, the greater the decline over time in the share who were banner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dentials and qualifications, appointment and promotion of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Qing considered examinations, service and accomplishments. In principle, through this system, ordinary soldiers could become military officers. According to our calculations, the proportion of officers who started their careers as soldiers remained above 60%, and the proportion of officers who held a military exam degree increased instead of decreasing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exams. This reflected the increasing rigidity of military recruitment in the late Qing. The Taiping War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Qing court's military policies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anked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与出身构成

陈俊 康文林

**摘要：**《中枢备览》是清代记载武官信息的名册，其记载量丰富、连续性强、可信度高，是研究清代军队人事递嬗的理想材料。本文依托73个版本的《中枢备览》，对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和出身构成进行了分析。从满汉比例来看，绿营中层旗人武官比例降低近30%，而下层旗人武官比例则一直保持在8%以下，总体呈现出官职越高，下降幅度越大的特点，“旗人退出绿营”间接表明清后期的军事集权政策最终走向失败。从出身构成来看，清代武选以行伍、武举、武职外放、军功等“多途并用”，客观上保留了普通士兵进入武官阶层的可能性；而行伍出身者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上，武举出身者比例在武科废除后不降反升，反映出清后期武选制度逐渐走向僵化。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清廷军事政策的调整是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群体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中枢备览》 中下层武官 满汉比例 出身构成

武官群体作为清代第二大官员群体，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罗尔纲、定宜庄、杜家骥等学者对绿营、八旗制度的考稽为武官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sup>①</sup>另有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武官群体展开了有益的探索。<sup>②</sup>但由于材料的限制，作为“群体之大多数”的中下层武官却鲜有人提及。中下层武官是清廷和军队之间的纽带，该群体的满汉比例可以直接反映清廷对军队的掌控力度，其出身构成是评判清后期武选制度和社会流动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以清代武弁名册《中枢备览》为中心，辅以《清会典》《清实录》等资料考察以上两方面的内容，以期充实对武官群体的研究，同时深化学界对于清后期军事集权政策实施和武官选任机制运行实际效果的认识。

## 一 中下层武官与《中枢备览》

### 一、中下层武官界定

① 参见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杜家骥《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目前学界主要关注高级武官、武科举、武官选任等方面的内容。相关研究如：王妍《清代旗人选任绿营提督考》，《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许雪姬《清代台湾绿营中的旗籍总兵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122页；臧云浦、王云度《中国历代武官制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王志明《清代督抚保题绿营武官的人事权》，《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李林《清代武科乡试中额及武举人群体结构试探》，《史林》2016年第6期；李林《清代武生的管理、训练和考课》，《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雷炳炎《康熙时期八旗武官的选任及其特点》，《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清代有绿营和八旗两大经制兵。绿营“脱胎于明代镇戍制度”，其官制和将领称谓基本承袭明代；而八旗是清代独有的军事制度，其官制和将领称谓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故两者对中下层武官的定义截然不同。绿营经制武官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九级。把总以下，还有非经制的外委千总、外委把总、额外外委，但此三种武官并不占经制缺额，所以《中枢备览》未有记载。<sup>①</sup>因此，本文所指绿营中下层武官，主要包括中层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及下层的千总和把总。

八旗官制经历朝改制，尤为繁杂。八旗又细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杜家骥和定宜庄两位学者分别对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的官制做了详细的考证。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中枢备览》的记录，将八旗中下层武官分为七类：各等侍卫、校官（骁骑校、前锋校等）、参领、佐领、使官（冠军使、云麾使）、尉官（城守尉、防守尉、整仪尉）、其他（蓝翎长、治仪正等）。<sup>②</sup>

## 二、《中枢备览》概况

### 1. 内容与特点。

《中枢备览》是清代记载武官信息的具有官方性质的名册，按季出版，用以“进呈御览”，常附于记载文官信息的《缙绅全书》或《爵秩全览》之后。<sup>③</sup>《中枢备览》记有武官的姓名、任职地区、身份、籍贯、官职、出身等信息，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一些学者曾利用《中枢备览》开展过研究。<sup>④</sup>

同时，《中枢备览》还具备高度结构化的特点，在构建量化数据库方面拥有先天优势。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将其辑录成数据库，以便分析研究。《中枢备览》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的主要资料来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清代缙绅录集成》。此外，数据库还收录了少量零散的本。数据库包含了73个版本的《中枢备览》，版本年代从乾隆末年延续到光绪末年，每个版本的记载数保持在7000-8000条，由此可见清代正式武官的数量极其稳定。<sup>⑤</sup>数据库现有59303名清代武官的个人信息，总记录数为517233条。<sup>⑥</sup>

### 2. 优势与局限

除记载量大、连续性强的特点外，《中枢备览》还具备可信度高的优势。《中枢备览》与官修会典的定额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两者的武官数额皆是取自兵部档册，可相互印证。<sup>⑦</sup>另查清人笔记，道光三十年（1850），“自提督至把总，共七千四百七十员”<sup>⑧</sup>。因数据库中没有道光三十年的版本，故取最近的道光二十九年秋的《中枢备览》验证，查得提督至把总共7321人，两者记录的

① 外委千总、外委把总是督、抚、提、镇在绿营经制定额之外委任的武官；而额外外委，《清会典》称“马兵内酌派给顶戴者，为额外外委”，故额外外委严格意义上仍为兵而非将。见（清）崑冈等修，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卷52《兵部·武库清吏司》，《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下。

② 本文所指八旗，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八旗。

③ 石鹏：《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万历及崇祯缙绅录研究》，《文献》2021年第6期，第131页。

④ 例如，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研究》一书中利用1881年的《中枢备览》统计了武官的出身构成比例，用以证明文武官员出身的差异；王月利用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中枢备览》（乾隆四十九年刻本）统计了绿营武官的满汉比例，用以证明清后期清廷对绿营控制力度减弱。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29页；王月：《清代八旗补放绿营武官问题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6期，第97页。

⑤ 关于《中枢备览》的来源，详见任玉雪、陈必佳等：《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66页。

⑥ 目前已收集到的《中枢备览》版本包括：1786年春、1788年春、1803年春、1834年秋冬、1835年春、1836年夏冬、1841年秋、1842年春秋、1843年春、1848年秋、1849年秋、1855年春、1857年冬、1859年冬、1860年春、1867年夏、1868年春冬、1869年冬、1872年夏秋、1873年春、1874年冬、1877年夏、1878年秋、1879年夏秋冬、1881年春、1882年春冬、1883年春、1884年春、1885年夏、1886年冬、1887年夏、1888年秋、1890年春秋、1892年春秋冬、1893年夏、1894年夏、1895年夏秋、1897年秋冬、1899年春冬、1900年春、1901年秋冬、1902年夏秋冬、1903年春秋冬、1904年春夏、1905年春夏秋、1906年春夏、1907年夏秋冬、1908年冬。《中枢备览》记载数普遍稳定在7000-8000条，但1834年冬和1879年夏只有3000余条记录，1901年秋有超过10000条记录（包含非经制的外委武官）。

⑦ 包含同一人在相同官职上的多条记录和在不同官职上的多条记录。

⑧ 例如，《中枢备览》1786年春山东绿营武官的总数为235人，（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定额为241人，两者仅差6人；《中枢备览》1882年冬四川绿营武官的总数为452人，与（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的定额一致。

⑨（清）钟绮：《皇朝琐屑录·凭花馆琐笔》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差异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由此可见,《中枢备览》对于绿营武官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但《中枢备览》也存在局限性:第一,由于部分禁旅八旗武官个人信息的保密性质,该材料对禁旅八旗武官的记载存在少量缺失的情况;第二,该材料受编纂体例的影响,早期版本中武官任职地的记载不够具体,同治六年(1867年)夏以后的版本则没有这一问题。但本文之分析几乎没有涉及禁旅八旗武官和武官任职地,故上述局限性并未对本文产生影响。

## 二 绿营中下层旗人武官比例变化及其成因

清廷利用驻防八旗压制绿营官兵,并在绿营内部分别设置满洲缺和汉缺,通过渗透的方式掌控绿营实权,建立起旗人占据绿营要职的高度集权的军事体制。《清会典》规定:陕甘、四川松潘镇的副将、参将旗人比例在14%—20%之间;直隶、山西副将至守备旗人占比应在4%—25%之间。<sup>①</sup>若照此规定,绿营内旗人武官比例并不高,但在实际执行中,清廷另规定“满洲、蒙古、汉军皆得用汉缺”<sup>②</sup>,而汉人武官不能补满洲缺,这就使得旗人占用汉缺合法化。因此,绿营实际的旗人武官比例应当要高于《清会典》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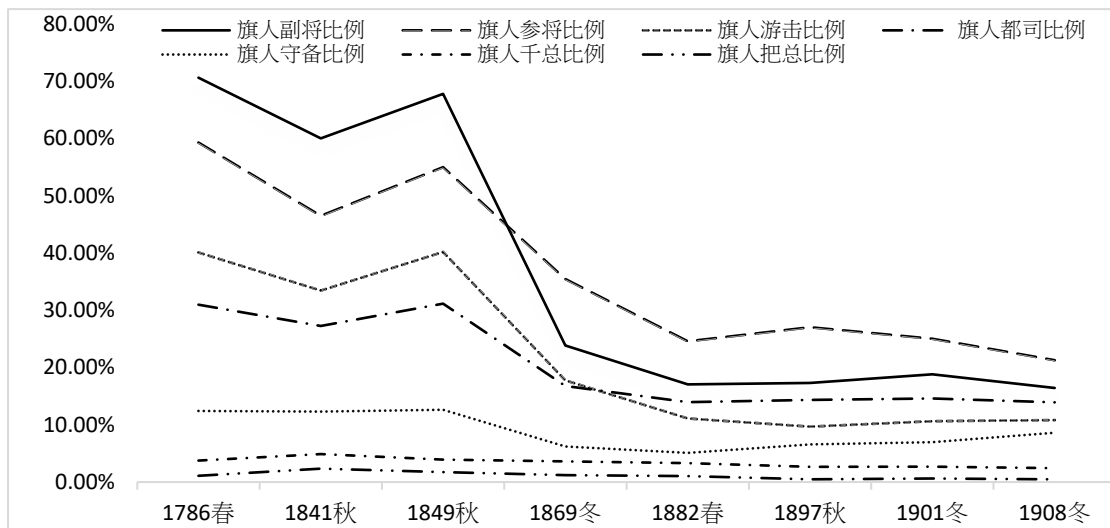


图1. 旗人在绿营各级武官中的占比变化

图1是根据《中枢备览》制作的折线图。从中可以看出,清后期绿营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变化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清后期绿营中层旗人武官比例明显降低,且官职越高,下降幅度越大。其中,旗人副将比例降幅最大,达到54%;参将至守备旗人比例降幅分别为38%、29%、17%、4%。与此同时,高层武官的旗人比例同样在下降,从嘉庆朝到清末,旗人提督比例降低了42%。<sup>③</sup>显然,在清后期动荡的军事环境下,大量旗人高、中层武官被汉人所取代,清廷对绿营的控制遭到削弱。

第二,绿营下层旗人武官比例一直较低且稳定。清后期,旗人千总比例未超过5%,旗人把总比例未超过3%。由于千总和把总的待遇差、地位低,旗人大都不愿担任。同时,在一些地区,“旗

① 根据绿营满洲缺和总官缺的额数统计。陕甘和四川松潘镇旗人武官比例、直隶和山西满洲缺数据见(清)崑冈等修,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卷46《兵部·武选清吏司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第445页下-446页上。直隶、山西总官缺数据见(光绪)《清会典事例》卷546《兵部五·官制·直隶绿营一》,《清会典事例》第7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页下;(光绪)《清会典事例》卷548《兵部七·官制·山西绿营》,《清会典事例》第7册,第82页上。

② (清)崑冈等修,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卷46《兵部·武选清吏司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第446页上。

③ 王月:《清代八旗补放绿营武官问题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6期,第98页。

人补用绿营低级武职”这一政策施行的时间较短。<sup>①</sup>因此，绿营下层旗人武官并不常见。

第三，绿营中下层旗人武官比例的起伏较大。这一比例并非一直下降，在19世纪40年代有过短暂回升，随后又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这一比例出现波动，说明绿营受战争、灾难等突发性因素的影响较大。

绿营中下层旗人武官比例呈现出上述特点是政策因素、社会因素、军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政策因素，主要包括武选制度的调整和军事集权政策的实施。第一，武选制度的调整。清廷一直在绿营旗人武官数量上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清廷既需要通过提高绿营旗人武官数量来加强对绿营的控制，又需要防止旗人大规模竞补绿营来保证八旗的独立性。因此，绿营旗人武官的数量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而武选制度的调整便成为了控制绿营旗人武官数量的关键。清后期，八旗“生齿日繁”，驻防旗人对绿营高、中级武职十分向往，脱离八旗之意愿日渐强烈。如道光元年，一等侍卫銜参赞武隆阿请以“驻防子弟一体挑补绿营”，但道光帝直接回绝。<sup>②</sup>因为在清廷看来，旗人竞补绿营是“不务正业之举”，大量旗人补放绿营后“轻视武事”，以致“骑射生疏”。尽管清廷对旗人竞补绿营长期持否定态度，但在实际武选中这一情况还是多有发生，故清廷调整了部分绿营武选政策：针对八旗武职外放制度，实施“降品补用”的政策，以削弱旗人前往绿营的意愿；针对引见制度，采取“满汉分派引见”的办法，控制旗人候选人的数量；针对选任制度，清廷令督抚遴选汉员武将，扩充绿营汉人武官的升途。这些政策在防止“绿营尽成满缺”和确保八旗的独立性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表1所示，绿营旗人武官武职出身者的数量由乾隆末年的436人减少到清末的153人，降幅达到65%，这表明八旗武职补放绿营的确受到了限制；而同时，汉人武官军功出身者的人数增长到400余人，军功出身者逐渐受到重视，表明“满汉分派引见”和督抚举荐等政策发挥了作用。

表1. 旗人武职出身、汉人军功出身者人数变化表

	绿营旗人武官武职出身者人数	绿营汉人武官军功出身者人数
乾隆五十一年春	436	13
嘉庆八年春	326	18
道光十四年秋	328	233
咸丰五年春	381	202
同治八年冬	213	225
光绪三年夏	185	299
光绪十一年夏	153	421

第二，军事集权政策的实施。太平天国结束后，清廷企图肢解湘军，意在重新加强军事集权。之后，曾国藩主动请裁湘军，其他湘军高级将领也服从清廷调遣，前往各地任职，这正中清廷下怀，但清廷所安置的湘军将领，多任督、抚、提、镇等高官，为督抚专权埋下了隐患。同时，为防范地方军事力量外溢不受控制，清廷“易勇为兵”，给许多勇营的汉人将领加衔或令其“尽先”升用，使其成为经制系统的一部分，由此，绿营中的汉人武官数量迅速增加，旗人逐步被剥离出来。随后，清廷又以“军务未竣”为借口将勇营分散到全国各地，<sup>③</sup>但此举冲击了边境和重点地区

① 杜家骥曾撰文考证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地旗人补用绿营低级武职的时间，自乾隆六年始，至乾隆三十一年前结束，只20余年，其余地区（主要是边疆地区）旗人补放绿营低级武职的现象依然存在。《中枢备览》的数据显示，甘肃旗人千总把总最多，广东次之，云南再次之。参见杜家骥：《清代旗人补用绿营官制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138、142页。

② 《清宣宗实录一》卷26，道光元年十一月辛酉，《清实录》第3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2页下-463页上。

③ 例如，同治三年十月，清廷称“甘肃军务未竣”，谕鲍超率霆营出关剿办；同治六年（1867）冬，清廷担忧苗疆叛乱，又令席宝田召精

绿营旗人武官的地位，使得汉人武官的比例进一步扩大。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战争后清廷的军事政策“以集权为目的，以分权为结果”<sup>①</sup>。太平天国战争后旗人武官数量的断崖式下跌，间接证明了清廷军事集权政策的失败。

其次是社会因素，即“旗人生计问题”。“旗人生计问题”自康熙末年开始出现，经雍、乾二朝发酵，到19世纪初已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廷面对“旗人生计问题”时，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处理方式，清廷或收缴流民土地，令八旗兵丁垦种以自养；<sup>②</sup>或利用官银发商生息，滋养八旗官兵；<sup>③</sup>或开垦边疆土地，给旗人耕种；<sup>④</sup>或收集营地地租，发放给旗人。<sup>⑤</sup>另一种是消极的处理方式，即让旗人自谋出路，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库亏空，清廷已不能按时支付兵饷，更无力处理旗人生计问题，只能对旗人进入绿营持默认态度，故道、咸年间绿营旗人武官数量有过短暂回升。表1中，道光年间绿营旗人武官武职出身者有328人，而咸丰年间上升到381人，增幅为16%。相对应地，19世纪40年代绿营中下层旗人武官比例也出现短暂回升，这与清廷对旗人生计问题的消极处理不无关系。

最后是军事因素，主要包括“地方军事化”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第一，“地方军事化”的影响。乾嘉之际，国内叛乱次数增多、规模扩大，绿营屡攻不克。军事上的连续失利使清廷不得不在武官选任和军权分配上做出让步：一方面，提拔、重用部分战功显赫的汉人武官；另一方面，开始尝试将军队的选任、操练、指挥权部分移交给地方文官集团，希冀能扭转战争颓势。嘉庆初年“傅鼐练兵”即是一个例证，“傅鼐练兵”后团练兴起，引发了“地方军事化”浪潮，促进了练勇地位的合法化。<sup>⑥</sup>绿营低级武弁、农民获得升迁机会，他们利用军功以及依靠地方实权官员的支持，逐渐抢占绿营官缺，而同时部分旗人武官武力废弛已久，被淘汰出绿营。

表2.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各地区绿营旗人武官数量对照表

地区	战前 (1849年秋)	战后 (1867年夏)	旗人武官 降幅	地区	战前 (1849年秋)	战后 (1867年夏)	旗人武官 降幅
京师	90	86	4.4%	浙江	47	16	66.0%
四川	46	22	52.2%	湖北	34	32	5.9%
山东	28	19	32.1%	湖南	28	15	46.4%
山西	58	50	13.8%	甘肃	77	33	57.1%
广东	89	33	62.9%	直隶	104	85	18.3%
广西	35	9	74.3%	福建	46	26	43.5%
江南	71	41	42.3%	贵州	46	25	45.7%
江西	17	14	17.6%	陕西	44	36	18.2%
河南	23	19	17.4%	云南	39	17	56.4%

注：表中所列数量，是指武官的人数，而非记载数。

毅营旧部入黔作战。参见王钟瀚点校：《清史列传》卷56《鲍超传》，《清史列传》第14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14页；王钟瀚点校：《清史列传》卷62《席宝田传》，《清史列传》第16册，第4913页。

① 林乾、皮明勇、方堃：《改革之殇：中国军事艰难的近代化之路》，《军事历史》2016年第3期，第4页。

② 《清宣宗实录三》卷162，道光九年十一月戊戌，《清实录》第35册，第508页下。

③ 《清宣宗实录五》卷296，道光十七年四月癸丑，《清实录》第37册，第590页上。

④ 道光十年，准伊犁将军玉麟奏，增添布甲200人，并开垦伊犁土地给旗人耕种。见《清宣宗实录三》卷169，道光十年五月戊午，《清实录》第35册，第614页上。

⑤ 道光十四年，准巴燕岱满洲营利用该地地租滋养旗人。见《清宣宗实录四》卷260，道光十四年十一月甲申，《清实录》第36册，第969页上。

⑥ 谢晓辉：《傅鼐练兵成法与镇筄兵勇的兴起：清代地方军事制度变革之肇始》，《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7页。

第二，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如表 2 所示，从空间上来看，太平天国战争后所有地区的旗人武官都在减少，而边疆省份降幅远大于内陆省份。广东、甘肃的旗人武官减少 40 人以上，降幅超过 50%；而地处作战区的浙江、江南等地的旗人武官则减少了 30 人以上，降幅超过 40%；西南地区的旗人武官均减少了 20 人以上，降幅均超过 40%；靠近京师的直隶，其旗人武官数量也减少了近 20 人。而在武官补充方面，绿营汉官缺不断有低级武弁和练勇递补，而满洲缺由于旗人数量和旗人递补意愿的限制，无法达到定额要求，只能“还缺于汉”，太平天国战争对绿营武官民族构成的影响可见一斑。太平天国战争同时冲击了绿营的军事地位，防军、练军、新军和新式海军的兴起造成绿营的地位边缘化，进而导致旗人前往绿营的意愿进一步降低，使得同光时期绿营中下层武官的旗人比例长期稳定在 11% 左右。同治八年冬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近 40 年间，旗人武官整体比例只下降了 4.4%。

### 三 中下层武官的出身构成

根据《清会典》和《中枢备览》，武官的出身大致可分为七种：<sup>①</sup>

一是世职。世袭职位主要是指八旗中的“世管佐领”，根据《中枢备览》，世职出身武官比例常年保持在 1% 左右，其数量稀少且稳定。

二是荫生。荫生具体分为难荫和恩荫两种，难荫生和恩荫生视情况而定品级。如公、侯、伯、文武一品官可荫子为四品恩荫生，文武二品官可荫子为四至五品恩荫生。<sup>②</sup>荫生定品后可授武职。荫生出身武官比例常年处于 1.2% 以下，从光绪二十八年夏开始，荫生出身武官的比例降低到 0.25% 以下。这表明，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优待政策在军队的执行力和影响力有所减弱。

三是武举。武举出身是指通过武科举途径成为武官。<sup>③</sup>

四是行伍。行伍是武官出身中的“第一正途”，八旗领催马甲、绿营勇卒、水勇、练勇等都属于行伍出身。

五是武职。以原官升用、改任、补调现官称为武职出身，《中枢备览》中武职出身的武官 91% 来自于禁旅八旗，故“武职”出身可以看作旗人武官的一个显著标志。武职出身的武官中有 48% 担任过侍卫，这是因为清廷曾允许“侍卫外放绿营”<sup>④</sup>。

六是军功。立军功者，可被授予世袭爵位，世袭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九等，公以下恩骑尉以上各世爵可按品补授绿营武职；还可能会被授予“巴图鲁”勇号。因军功而被授予武职者，其晋升之途较一般武官更加顺利。

七是非上述六类出身者。如督抚保举、文职改武职等，属于少数现象，列为“其他”。

图 2 是利用《中枢备览》数据库中全部 73 季的记载数制成的面积图，展示了中下层武官各出身的比例逐年变化。图中颜色由浅到深、位置从上到下的部分依次是武职、武举、军功、行伍、其他。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武官的主要出身为行伍、武举、军功、武职四项，这四种出身的武官占到了清后期武官总数的 90% 以上。

<sup>①</sup> 《清会典》对于武官出身的界定较为含混，只分世职、武举、荫生三类。因编纂体例的问题，《中枢备览》只记载武官最终的出身，故存在武职、军功、行伍、保举等出身。见（清）崑冈等修，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卷 46《兵部·武选清吏司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794 册，第 444 页下。

<sup>②</sup> （清）崑冈等修，吴树梅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卷 46《兵部·武选清吏司一》，《续修四库全书》第 794 册，第 444 页下。

<sup>③</sup> 武科捐纳功名较文科举而言更为宠统，《中枢备览》未有直接标识，故本文所指武举出身亦含武科捐纳。武科捐纳群体有待进一步识别。

<sup>④</sup> 侍卫或在侍卫上行走满三年者，经引见可补绿营都司以上官缺，“以参将游击之缺，用一等二等侍卫”；“以游击都司之缺，用三等侍卫”。见（光绪）《清会典事例》卷 561《兵部二十·职制·铨选一》，《清会典事例》第 7 册，第 273 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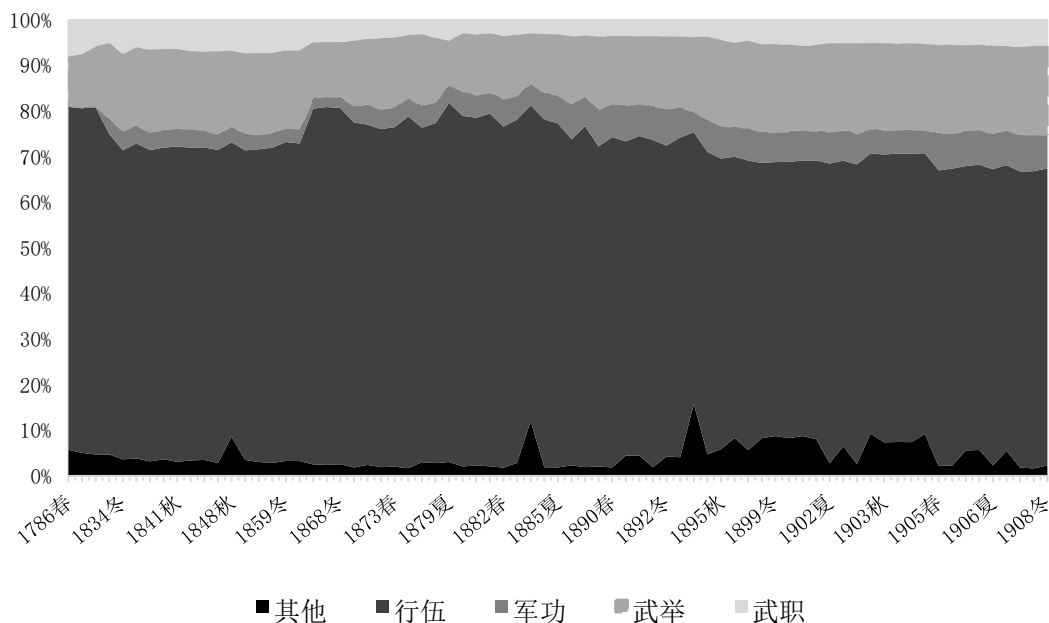


图2. 中下层武官的出身构成变化面积图

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出身构成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中下层武官选拔“多途并用”。从乾隆末年到光绪末年，武职出身者比例降低3.5%；军功出身者比例增长7%；武举出身者比例增长9%；行伍出身者比例虽降低10%，但仍为最高。从图2可以看出，各项出身比例在清后期均未发生明显的错位，可见中下层武官的出身结构颇具稳定性，进而反映出清代武选“多途并用”政策的延续性：即便到了清末，仍有超过80%的武官是被军内晋升机制和传统武举选拔出来的，还有7%的武官是被完善的军功爵制度选拔出来的。一方面，“多途并用”政策造就了稳定的出身结构，促进了武官阶层的社会流动，确保了武官群体具备新陈代谢的活力；另一方面，稳定的出身结构延续了“多途并用”政策的生命力，从而巩固了军机处和兵部在军队中的核心地位，加强了军事集权。然而，长期稳定的出身结构也会致使“多途并用”政策走向僵化，导致其促社会流动能力和甄别能力变差，尤其在清后期军功贬值、保举泛滥、冒功盛行、捐纳大开的环境下，无法对真、假军功进行有效甄别。

以“巴图鲁”勇号为例，清前中期，清廷在敕封巴图鲁勇号时尤为谨慎：康熙年间，未有武将获封巴图鲁勇号；雍正年间封2人，后夺去其中1人巴图鲁勇号；<sup>①</sup>乾隆年间，封109人，削去4人勇号。<sup>②</sup>但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武官获得巴图鲁勇号的门槛降低。根据《中枢备览》，道咸年间仅有11人获得巴图鲁勇号，而同光时期有多达195人获得巴图鲁勇号（表3），其中100人为行伍出身。这206名“巴图鲁”中，51%都是绿营中下层武官，其中不乏贿赂地方官员谋求保举赐号的武官，或者屠杀平民谎称剿灭土匪邀功的武官，更有甚者，只通过花钱便可捐得勇号。清后期，部分武官通过冒功、捐买等方式进入到高级武官序列，致使“多途并用”仅仅体现在高、中级武官群体中（表4），从而加剧了武官阶级分化。

① 根据雍正朝实录统计。雍正朝曾敕封过“达尔汗巴图鲁”及“墨尔根巴图鲁”勇号。雍正十一年，因持有者玩忽职守，又夺其“墨尔根巴图鲁”之号。见《清世宗实录二》卷110，雍正九年九月庚午，《清实录》第8册，第463页上；《清世宗实录二》卷124，雍正十年十月癸亥，《清实录》第8册，第628页下；《清世宗实录二》卷133，雍正十一年七月庚癸，《清实录》第8册，第719页下。

② 根据乾隆朝实录统计。因西北战事，乾隆朝敕封“巴图鲁”数量远多于康熙、雍正二朝，其封号风格多元化并开始出现汉语化封号。例如，乾隆二十二年之“额呀斯巴图鲁”、“呼尔察巴图鲁”；乾隆三十九年之“奋勇巴图鲁”；乾隆五十三年之“朗阿巴图鲁”。见《清高宗实录七》卷530，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上丙午，《清实录》第15册，第685页下；《清高宗实录十二》卷967，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下甲戌，《清实录》第20册，第1161页上；《清高宗实录十七》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上癸巳，《清实录》第25册，第815页下。



表 3. 道咸、同光时期 206 名“巴图鲁”出身状况

时间	总数	行伍出身	军功出身	武举出身	武职出身	世职出身	其他或不详
道咸年间	11	4	2	4	1	0	0
同光年间	195	100	55	30	2	1	7

其次，行伍出身者的比例很高。与前代相比，清代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武官更多。有学者统计了部分北宋武将群体的出身和来源，发现约有 65%左右的武官是军事贵族或外戚扈从，而出自军班行伍者仅占 26.5%。<sup>①</sup>可见，北宋真正从底层士兵成长起来的武官只占少数。明代实行武职世袭制度，武官系统“进”大于“出”。<sup>②</sup>同时，明代文臣可荫子武职，但嘉靖以降，文臣夤援攀附者数量激增，导致文臣荫武冒滥。<sup>③</sup>而在镇戍营基层武官的选拔中，行伍白身者直至嘉靖中叶以后才被大量委用。<sup>④</sup>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武职虽增多，但大都是有身世社会背景，行伍出身者比例亦不高。而清代虽同样实行“世兵制”，但其行伍出身者的比例较明代更高。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即便到了清末，行伍出身者的比例依然超过了 60%，这说明清代实行了较为开放的军内晋升制度。但行伍出身的武官多集中在低级武职中，如表 4 所示，绿营低级武官中，行伍出身者比例高达 80%，中级武官行伍出身者比例近 42%，而高级武官行伍出身者比例仅为 25%。捐纳大开后，高、中级武官中不乏捐买武科功名而获官职之人，亦不乏直接捐买高、中级官衔之人。捐买的耗费，出身行伍的基层武官难以负担，他们只能在军队中依靠资历、战功从底层晋升，但即便有军功加身，其晋升之路也很漫长。大量出身行伍的武官停留在低级武官的序列，高、中级武官的职位仍然被旗人贵族、军事贵族、商人子弟等群体所把控。总之，清后期的军内选拔制度和武举制度保留了普通兵丁进入官僚系统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成为了其晋升的障碍。

表 4. 绿营各级武官出身构成

	武职	武举	军功	行伍	其他	总计
高级武官	127 (35.1%)	43 (11.9%)	71 (19.6%)	90 (24.9%)	31 (8.6%)	362 (100%)
中级武官	2533 (18.2%)	2937 (21.2%)	1434 (10.3%)	5795 (41.7%)	1187 (8.5%)	13886 (100%)
低级武官	42 (0.1%)	6590 (15.6%)	931 (2.2%)	33759 (80.1%)	847 (2.0%)	42169 (100%)

注：表中所列数量，是指武官的人数，而非记载数。

第三，武科举废止之后，武举出身的武官比例不降反升。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废除武举制度。然而，从此时到光绪三十四年，“武举”出身的武官比例一直保持在 19%以上，甚至有略微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清后期武科捐纳盛行。同光时期捐纳大开，捐买武科功名之人不计其数，但武官系统“候多缺少”，武选制度的滞后性被放大，故即使废除了武科举，清廷仍要不停地安置捐纳候补之人，以确保其政策的公信力和延续性。延展来说，武举出身者的比例不降反升暴露出清末武选改革流于表面的问题，通过武举选材的许多措施难以产生实际效果。

① 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 页。

② 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1 页。

③ 秦博：《明代文官荫子武职制度探析》，《史学月刊》2015 年第 11 期，第 54 页。

④ 曹循：《明代镇戍营兵中的基层武官》，《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44 页。

清代行政机构和官僚队伍的规模有限，正式文职官员未超过2万人，<sup>①</sup>正式武职官员未超过1万人，中下层武官的数量占到了正式武官总数的95%以上。不同于明中后期出现“武官冗积”的现象，清中后期武官群体始终保持着有限的规模，这与清代的官缺定额制度和武官选拔制度不无关系。八旗武选封闭性和独立性强、候选限制严格、世袭职位多，带有浓厚的满洲色彩。绿营武选则颇具开放性，以世袭、军功、荫生、武举、旗人外放、行伍、保举、文改武等多途并用，客观上保留了普通士兵进入武官阶层的可能性，确保了武官阶层社会来源的多元化；“多途并用”造就了武官群体稳定的出身结构，武举和行伍出身者比例超过80%，世职、武职、军功出身者比例不到20%。世袭武官比例低间接保证了武官退出机制持续运转，促进了武官阶层的社会流动。但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绿营武选制度逐渐僵化，武举出身的武官中充斥着大量捐买功名的投机者；尽管行伍出身者的数量在战后增长了10%，但被困于低级武官的行列，难以升迁；而新式军事教育培养出来的中、低级军官，未经历练即被大量投入战场，故未能对武官群体进行有益的补充。武选制度的僵化，造成武官军事素养降低，使军事腐败问题进一步恶化，最终反噬清廷军事中枢，加速了军事衰败。

**【项目说明】**本文系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Disasters and Official Careers in the Qing Civil Service, 1830-1912”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602621 (Campbell PI)。

（作者陈俊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康文林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代理院长兼讲座教授（香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邮编 430070）

---

<sup>①</sup> 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4页。